

《一千英亩》中金妮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解读

李冰冰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省大连市 116000

摘要:《一千英亩》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简·斯迈利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中,斯迈利以女性第一人称视角描述了库克家族的兴衰史,揭示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本文将运用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对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金妮的生存处境,“他者”身份与自我觉醒,以及自我超越进行解读,探讨男权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困境和获得独立的正确途径,表达了新一代美国女性摆脱传统束缚,获得独立自由的愿望,以期引发我们对当今社会中两性关系问题的深刻思考,坚定我们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的信心。

关键词: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生存处境;“他者”身份;自我超越

简·斯迈利素以深入刻画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见长,其代表作《一千英亩》于1991年问世后好评如潮,接连荣获1992年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故事发生在1979年的爱荷华州,讲述了在一个传统父权家庭中,父亲把农场分给三个女儿后,由土地的分割与继承引发的一系列纠纷。斯迈利控诉旧社会父权制及其现代残余,发出对男女平等的呐喊,对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对《一千英亩》的研究趋向多样化,主要从《一千英亩》与《李尔王》的互文性,生态主义,性别与心理分析等角度进行解读。本文另辟蹊径,以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为视角,从生存处境,“他者”身份与自我觉醒,以及自由选择和责任三个方面解读金妮的自我超越。

一、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

波伏娃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在《第二性》中运用存在主义哲学对女性处境进行分析和研究,系统地阐述了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并勇敢地向世界宣告:“我们将用存在主义来研究女性,并给予我们应有的关注。我们的观点是存在主义的观点”(Beauvoir 3)。其主要理论包括女性的生存处境,女性的“他者”身份和自我觉醒以及女性的自我超越,这种自我超越体现在自由选择和责任承担上。

二、金妮的生存处境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Beauvoir 273)。女性的所有特点都可以从她所处的环境中找到原因。女性被压迫的根源就在于其处境,因此,女性要自我超越

就必须从处境入手。

(一) 金妮的客观生存处境

金妮所处的泽布伦县是典型的父权社会,人们受西进运动土地扩张的影响,尊敬并赞誉拥有大农场的人,并认为女性属于私有财产。“因为女性一无所有,所以她没有被看作是有尊严的人;她自己是男性财产的一部分,首先是她父母的,然后是她丈夫的”(Beauvoir 90)。金妮的婚姻基于父亲拉里和丈夫泰的利益关系。“泰最好的地方是他吸引了我爸爸”(Smiley 262)。在这段婚姻中,金妮被父亲视为个人财产以换取泰的土地。对丈夫来说,金妮是帮助他得到拉里一千英亩的筹码。

在父权制社会,女性不仅被男性物化,她们的需求和牺牲也被忽视。尽管父亲殴打了金妮,但金妮得不到任何社会支持。他人的支持对于女性摆脱压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社会支持压迫者,被压迫者会失去对社会的归属感。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和社会支持的缺失使金妮难以实现自我超越。

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往往感到迷失自我。无论她们在哪里都处于不利地位。金妮不仅在社会中受到压迫,在家庭中也受到伤害。

拉里从未尽到一个合格父亲应有的责任。金妮母亲的形象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希望女儿拥有更多选择。另一方面,她在某种程度上是拉里的帮凶,她没有能力对抗她的丈夫,这对金妮来说无疑是错误范例,让金妮相信男性权威无法超越。因此,金妮潜移默化地成为了传统意义上的“家中天使”。父亲的虐待以及母亲的软弱导致她遭受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伤害。

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家庭中，女性的处境都举步维艰。诸多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构成了父权制的本质。更糟糕的是女性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应该服从，麻痹自己的思想，无意义地消耗生命，无法实现自身价值。

（二）金妮的主观生存处境

在男权社会中，男性认为自己是绝对的统治者，对女性施加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迫。金妮生活这样的环境中，身心均受到父权制奴役。

金妮并非生来就对自己的身体丧失信心。她也曾因自己美丽的双腿感到骄傲，并将其视为珍宝。母亲告诫她不要穿展现女性身材的衣服，也不要欣赏自己的美。“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弱点时，她的大部分信心都崩塌了；这是她将自己女性化，意识到自己是被动的，依赖他人的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信心就是对自己失去信心”（Beauvoir 344）。金妮是一个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信心的女人，她因自己女性气质的局限性感到自卑。

金妮的灵魂也受到了父亲的摧残。“爸爸在任何场景中的出现都会使周围环境变暗”（Smiley 45）。父亲给她带来的是恐惧和焦虑，但金妮仍然崇拜他，因为他是拥有一千英亩的伟大农场主，她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服从和取悦他。金妮沉默自己的声音，忽略自己的感受，她自由发言的权力被剥夺，寻求自我意识的诉求被拒绝。

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以及身体和灵魂的双重缺位迫使金妮服从于父权制。金妮没有信心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父权制就像一块厚厚的黑布遮住了金妮望向未来的双眸。

三、金妮的“他者”身份与反抗

金妮虽然被父权制意识形态所异化，但她逐渐从现实中觉醒，改变了对父权的态度，开始与“他者”身份作斗争，不断唤醒自己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

女性的“他者”地位是在生存处境中形成的。首先，崇尚父权制的历史形势决定了金妮必然受到社会准则的束缚。拉里正如罗斯所说“他对待我们就像对待池塘，房子，猪或庄稼一样。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Smiley 207）。恐惧是父亲给予她最普遍的情感体验，她总是特别注意地称自己为女儿，而不是女人。其次，男性将女性物化，认为她们是私有财产。在和金妮吵架时，父亲咒骂她“你不是一个女人。我不知道你算什么东西”（Smiley 196）。父亲没有平等地把她当作一个有尊严，有个性 and 有需要的人。

金妮对父亲的态度改变体现在其心理和言行的变

化上。金妮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她意识到自己因为长期的沉默与忍耐错过了许多美好的事物。当金妮走到父亲家门口时，她听到了拉里的责备，因为她没按时带来鸡蛋。那时，她内心的声音是“让他等，或者不给他鸡蛋”（Smiley 114）。面对父亲酒后驾车的鲁莽行为，金妮用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警告他：“我要拿走卡车的钥匙。如果你以后再这么做，我就把它卖掉。我小的时候，你总说警告就足够了。这次是对你的警告，我希望你注意”（Smiley 148）。金妮说了三次“我”表明她开始为自己发声，展现出她作为一个坚定的女人的一面，而不再是一个温顺的女儿。

金妮对父权的反抗也体现在指控拉里的暴行上。一个人的过去或历史对一个人的身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历史是人们获得身份并理解经历和世界的一种方式。如果一个人忘记了过去的经历，她将无法更好地理解 and 认同自己。记忆和怀旧不会阻碍女性的发展，而会很好地鼓励女性面对过去（McDermot 389-407）。金妮通过恢复失去的记忆意识到拉里这一痛苦根源，并在法庭上进行指控。正如金妮所说，“我的新生活，又一个新生活，已经开始了”（Smiley 229）。

在极其不利的生存状况下，女性根据男性的要求被压制在“他者”的位置上（Beauvoir 55）。金妮意识到父亲的齷齪后，在心理上和行动上都唤醒了自我。女性只有在意识到“他者”身份后，才能开始获得自我意识，进而采取行动反抗。

四、金妮的自由选择与责任

人类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找到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所以即使在男权社会中，她们仍然有追求自由的权利（Beauvoir 115）。虽然自由选择并不容易，但斯迈利呼吁女性尝试重新定义自己，解放自己于困境。

金妮为了摆脱“他者”身份不断做出选择，并勇于承担选择的后果。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只有当女性自由选择时，她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是真正自由的，并且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金妮在经历了库克家族的兴衰后，承担起责任并实现了自我超越。

（一）对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获得人身自由是解放精神自由的先决条件。父权社会将女性限制在家庭中，她们扮演女儿，妻子或母亲的角色。金妮无法忍受基于金钱和利益的婚姻，她拿着外套，围巾和车钥匙走出了门。她离开得不仅仅是她的

家,更是以父亲和丈夫为代表的父权制农场,她最终结束了这些限制和束缚她的关系,这是她实现自我超越的第一步。

金妮渴望光明的未来。自从她第一次注意到路边的房子即从急诊室接酒驾的父亲时,她就梦想着在城市里过不同于农场的生活。离开农场在城市找到工作实现经济独立后,金妮改变了羞怯,懦弱,忍气吞声等消极的性格,增强了她的自我认同感。她工作的城市是“一个你可以吃早餐,吃给人以希望的食物,有事可做的地方”(Smiley 281)。她不再受男性的控制,变得乐观而充满活力,这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充满魅力。金妮终于看清了所有人包括她自己,她能够依照内心做出判断和选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她最终从父权的枷锁中解脱,寻求精神自由并实现自我超越。

精神是行动的基础,它可以支撑人们度过黑暗。对于金妮来说,她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支撑着她曾经毫无意义的生活。正因如此,她才有勇气和力量与自己的命运和父权制抗争。

(二) 对自己和他人承担责任

人做出选择后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也是存在意义的一部分。金妮要为自己离开农场这一选择负责。首先,她需要对自己负责。为了生存,她承担起经济独立的责任。金妮在远离泽布伦县的一个城市中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她在与他人交谈时不再感到紧张或羞愧,相反,她喜欢与他人相处。金妮不再依赖男性,从一个言听计从的农妇蜕变成一名自力更生的现代女性。几年后,当她遇到泰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她想说的话,她话语中蕴含的内在力量甚至让泰感到不知所措。金妮通过工作成功地培养了独立的性格并实现了自我超越。

除了为自己负责,金妮还需要为他人承担责任。在小说的结尾,传统的父权社会崩塌瓦解,虐待金妮的父亲最终患上了精神疾病,死于心脏病发作;金妮的丈夫没能经营好农场便离开了;辱骂罗斯的丈夫淹死在池塘里。因此,金妮承担起抚养罗斯女儿的责任,将其送入大学开启新生活。然而,即使在经历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后,金妮面对两性关系也并不极端,她倡导和谐的两

性关系,教育罗斯的女儿与男性平等共处。“男人和女人必须在一些事情中超越他们的自然差异,毫不含糊地确认他们友爱的关系”(Beauvoir 766)。

女性的觉醒并不意味着男性的失败,女性的自由也不是要超越男性的地位,而是要实现性别平等。在女性的反抗下,父权制不会长久存在,当女性推翻男权统治时,男女间的矛盾被消弭化解。

结语

本文基于波伏娃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框架,对《一千英亩》中男权社会中金妮的存在进行解读。根据这一理论的内涵,本文分析了金妮的生存处境,“他者”身份以及自我超越。

女性受到男权社会准则的束缚和男性的物化,她们的自信也因身体和灵魂的压抑而丧失。在这样的处境中,女性被视为“他者”。金妮在意识到“他者”身份后,采取行动反抗父权。金妮不再是相对于男性的“第二性”,她选择离开农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追求新生活。同时,她也承担了相应责任。金妮最终实现自我超越,脱胎换骨,成为了一名新时代独立女性。

斯迈利鼓励女性争取与男性平权,努力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开拓男性与女性同生共荣的平等和谐新世界。这体现了她对于女性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主义困境以及实现自我超越途径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 [1]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2.
- [2]McDermott, Sinead. “Memory, Nostalgia and Gender in A Thousand Acres.” *Sigrvs*. 28 (2002): 389-407.
- [3]Smiley, Jane. A Thousand Acres. London: Harper Perennial, 2008.
- [4]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5]简·斯迈利著,张冲,张瑛译.一千英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